

现代史学 分支学科概论

◎ 于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

于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
ISBN 7-5004-2404-3

I. 现… II. 于… III. 史学-分支科学-世界-现代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15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育才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63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5.8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社会史	(5)
第一节 社会史的缘起和在西方的发展	(5)
第二节 社会史在中国	(12)
第三节 作为方法的社会史	(18)
第四节 作为学科的社会史的失败	(24)
第二章 文化史学	(35)
第一节 什么是文化	(35)
第二节 作为文化史学基础的文化学	(44)
第三节 文化史学的内容与范畴	(52)
第三章 心理史学	(67)
第一节 西方史学从封闭到开放，到同心 理学的结合	(67)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他对 历史问题的探索	(73)
第三节 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	(87)
第四节 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	(96)
第五节 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	(107)

第四章 城市史学	(111)
第一节 城市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111)
第二节 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	(113)
第三节 法国的城市史研究	(132)
第四节 美国的城市史研究	(141)
第五章 家庭史学	(149)
第一节 家庭史学概述	(149)
第二节 家庭史学的学术意义	(167)
第六章 政治史学	(186)
第一节 政治史学和传统的政治史研究	(186)
第二节 美国新政治史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189)
第三节 新政治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成果	(195)
第四节 80年代以来美国新政治史学的变化与发展	(214)
第五节 战后美国政治史学评析	(223)
第七章 口述史学	(228)
第一节 口述史学的特点	(228)
第二节 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之不足	(231)
第三节 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235)
第四节 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241)
第八章 计量史学	(249)

第一节	计量史学的发展过程	(250)
第二节	计量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271)
第三节	计量方法概述	(283)
第四节	8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发展的特点	(299)
第九章	比较史学	(302)
第一节	历史比较研究发展概述	(302)
第二节	历史比较方法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309)
第三节	历史比较的原则、类型和过程	(317)
后	记	(326)

前　　言

如果说 19 世纪因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得到空前迅速发展而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话，那么 20 世纪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世纪。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史学思潮的勃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

自 20 世纪中叶起，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和理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当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已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视或忽略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学，至少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

“文革”结束后，我国历史学研究拨乱反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史学结束了自我封闭、与世界史坛隔绝的状况，开始成为世界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的中国推动了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联系，自 80 年代中期起，一些学者开始将近年在国外（主要是在欧美诸国）形成，并在科学实践研究中产生一定影响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介绍到国内来，令不少史学工作者耳目一新，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从不同方面得到启迪。通过借鉴

其有益的成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自己的研究效率和科学水平，对中国史学发展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史学来说，一般性的介绍是必要的，特别是对结束封闭状态不久的中国史学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这些介绍毕竟代替不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惟有更深入更系统的对历史学分支学科进行研究，才能对开放的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更有益的影响。因为一般性的介绍只能告诉读者“是什么”，进行感性的描述，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对一系列问题缺少理性的分析。基于上述认识，各位撰稿人在对有关问题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依据大量的国外文献，分别就文化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新政治史学和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代表性人物、著作及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现在奉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即是这些研究的成果。

上述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某些内容，在19世纪的史学发展中即已出现，但那时多是单独的概念或尚未形成较完备形态的理论，而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科学分支学科，则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所以也一并列入了编者的研究计划之中。此外，鉴于各个分支学科的具体内容、发展进程及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同时对每一分支学科进行全面研究所具备的客观研究条件也不同，所以每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可能是统一的模式。总之，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细心阅读本书的读者不难看到，每位研究者都是尽可能最广泛地占有文献资料，从该分支学科的实际内容和具体特点出发，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在20世纪中期，陆续形成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性结果。

20世纪，社会矛盾运动的脉搏明显地加快了，同以往各个世纪相比，近百年间人类社会所发生巨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领域革命性爆炸性的事件令人目不暇接，现实中的人们迫切需要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的历史以认识现实，预测未来，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迅速增长。然而，仅仅是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对史料进行考订和辨析，是无法胜任上述任务的，于是与传统史学观念有别的新史学应运而生。新史学之所以是“新”史学，在于它对历史进程由以往进行史实性的描述开始向理论性描述转化，强调分析和诠释；由重视对英雄人物研究转向对社会底层一般民众的研究，强调“从底层向上看”，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看作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新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客体是“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历史研究的领域明显扩大了，随着史学家研究视野的开拓，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历史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口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以及计量、比较等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历史学。这些方法在充实和丰富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使传统史学的内涵在本世纪中期以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致有些学者提出，在20世纪，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

近百年来，历史学各种形式的新史料虽不断被发现和整理，但分析和不断地揭示史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却始终是当代史学的主题。对当代史学来说，发现和整理史料的时代结束了，理论分析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学开始成为大多数史学家的共识。历史认识客体日趋复杂化促进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的宏观研究时，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往往会影响这一研究的进行，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若想有存在的价值和获得发

展的动力，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回避时代提出的要求。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客观上反映了时代对史学发展的呼唤，而不是通过人为干涉或政治型干预而出现的科学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历史科学在新的发展时期规律性的发展结果，史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提高科学的研究的效率是有重要意义的。

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决不仅仅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是建立在崭新的历史思维的基础上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历史科学的深刻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科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文化转型日趋加强，历史学一系列分支学科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得到加强，而且可以预料，在未来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这些分支学科必将得到发展。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史学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年轻的分支学科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 21 世纪，将是历史学更加辉煌的世纪。

第一章 社会史

在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对本世纪的历史学成就作一审视，即不难发现：社会史无论对西方史学界还是中国史学界都曾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肯定必将会越来越大。

第一节 社会史的缘起和在西方的发展

虽然作为一个完整词汇的“社会史”早在本世纪初年就曾出现于中国学术界，但作为今天已成流派的“社会史”，其鼻祖却只能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以 1929 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为标志。年鉴学派是经济社会史年鉴学派的简称，实质上就是社会史学派。他们作为 19 世纪盛行于史学界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面横空杀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史学流派。这一学派想要告诉人们的，一是在史学研究中“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二是指出了研究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应该成为史学创新的方向。他们在刊名中先后使用的“经济”、“社会”、“文明”等词都是一些“广义的、能把物质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字眼”。也许杂志创办人马克·布洛赫

的解释最能说明问题：“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最终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① 年鉴学派提供给史学界的是全方位研究“全面的历史”的目标和努力。其本意是进一步拓展史学视野，使叙述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得到充分的结合，以便完成总体史学的整体架构。

在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中，他们力主对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要用全新的视角与方法发掘出振聋发聩的历史内涵。他们反对政治史独居一尊，却并未将政治史排拒于史学的视野之外。布洛赫在其巨著《封建社会》中，“企图再现他所谓的‘整体社会环境’。封建主义被表现为时代社会风尚和精神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这一精神结构中，工作方式和思想方式、统治和依附关系、贫富之间的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②。费弗尔在他的《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显示出这种对上层阶级的倾心关注”^③。布罗代尔则在《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决定在‘政治’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含义上，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其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中去”^④。因此，在年鉴学派的笔下，“社会史”是他们进行全部史学创新的代名词。他们正是用这一内涵模糊的概念做了他们想做的一切。巴勒克拉夫对年

① [法] J. 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11 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美]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 页。

③ 同上书，第 58 页。

④ 《新史学》，第 64 页。

鉴学派的影响曾作过如下比较准确的评述：“新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①

就在法国年鉴学派转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模式和方法时，美国的历史学家也同时走上了史学革新之路，而且其道路的指向与年鉴学派的创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一批专业史家就在反对此前流行于美国的以治史为消遣的传统之同时，致力于将视点从贵族转向平民。19 世纪后 30 年，美国史学界最杰出的两个代表爱德华·埃哥斯顿和约翰·麦克马斯特提出了他们的历史观。埃哥斯顿在着手写作一部多卷本美国史时，就在脑海中规划它“不是一部联合各州的历史……而是一部生活史，包括民众的生活、他们思想和习俗的来源，以及他们有史以来的变迁”，并决定将以主要笔墨用于叙述“人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服饰、食品、情感、思想和生活方式”。1883 年，麦克马斯特出版了他的《美国人民史》第一卷，他宣称“我的目的是描述一个时代的服饰、职业、娱乐和文学，记录习俗和道德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命名自己的著作作为“社会史”。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贵族史家已销声匿迹，占据史坛阵地的是受雇于不同专业机构、依靠定期薪俸生活的专业史家。由于他们多来自社会下层，其治史目光便集中于非特权的社会集团和阶层，以致于施莱辛格发出了“大人物不过是伟大的多数借以表达思想的传声筒”的慨叹。此时，从社会角度

① [英]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4 页。

观照历史的著作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如被誉为“标志着社会史学发展到一个分析性综合的新阶段”的查尔斯·毕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就是“运用具体的经济材料研究宪法创始人的社会立场，从他们社会立场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差异分析美国宪法这一政治和法律文件的起源”^①。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看法渐趋一致，“新一代社会史家多数不再将社会史视为历史研究中一个以对象划分的专题分支，而是当作从社会观点出发的历史，即‘对社会的历史观’。它包括了所有历史学的专题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是一种‘以社会集团，尤其是社会经济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方法’。它研究的范围决不仅限于传统上称之为‘社会’方面的问题，不排除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活动”。在这一方面，某些美国的中国史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其“社会史”含义也许更加直观。比如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就是分别从“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和从社会史角度“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形”^②。

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呈现了与法、美相同的情况。

以 G. M. 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一书为代表，英国的传统社会史学者认为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社会史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一主张遭到了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激烈反对，认为他们对社会史研究范围的限制使社会史研究变得琐碎浅薄，坚持“社会的历史是历史”，“社会史不像经济史或其他连字号连接的历史，它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

① 满云龙：《美国社会史学的兴起与美国的社会与文化》，载《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96页。

② 王庆成为该两本书中文本所写序言。两书均由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专门化学科，因为它的主题不能孤立起来”^①。为此，他身体力行，在史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社会史”思想。比如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间应在 20 世纪初的论文中，“他的分析既体现了总体史思想，同时也是一种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的结构、模式的研究。此外，在对工人阶级意识及其生活方式的研究中，由于工人不可能像知识分子那样把自己的观念意识用文字记载下来，于是，霍布斯鲍姆独辟蹊径，拓宽史料范围，从服饰、食品、旅游、足球等方面进行考察。这些都是他对新社会史所做的贡献”^②。因此，霍布斯鲍姆的成就主要在于运用社会史方法带给英国史学界以实学卓见。

由于社会史强调的是一种全方位追求的目标和努力，因而它的影响就绝不可能如同所有史学分支那样只是填补了史学研究的某一空白，而是带给史学研究以强有力革命性影响，巴勒克拉夫就曾逐一考察过社会史研究在欧洲各国的巨大影响。他说：“年鉴学派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在意大利，它引起历史学家‘逐渐摆脱克罗齐的立场’。在德国，它虽然经过了一番别具特色的改造，但影响到席德尔、康策和（惟一的中世纪史学家）博斯尔的历史观念，而且对 1945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历史学家（例如韦勒）的影响则更大。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逊，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③当然，这只是就个别历史学

① E. J. 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姜芃：《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八十年代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英] J.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2 页。

家和个别事例而言的，如果从其对近半个多世纪的西方史学史的影响来说，其意义似乎更大。

成就之一：社会史研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史学革命，即新史学的诞生。在新史学的发生、发展中，“社会史”是一面不可或缺的旗帜，是新史学持续进行的前提条件，对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保护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社会史”，就不会有新史学。

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是他们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正是有了经济、社会史的这面旗帜，也正是这面旗帜激活了史学家对旧史学干瘪与狭隘的不满情绪和对有血有肉的新史学的渴望，史学的革新才有了基本的动力，新史学的持续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冲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社会史”这面旗帜，而只是用空泛的、不着边际的、需要详加解释的“新史学”或“史学革命”一类口号去呼吁史学的革新，新史学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史学界不断地卷起旋风。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社会史”内涵的这种严重歧义和模糊不清所产生的巨大的包容性，为年鉴学派及后继者们在进行史学变革时的随心所欲开辟出了足够的天地，也为他们对全部人类历史进行或局部或整体的重新解组提供了逻辑保证。假如“社会史”一词如同“家庭史”、“服饰史”等词一样含义清晰，新史学的成就恐怕就只能局限于史学的细枝末节，而不会引起对人类历史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新体察。今天看来，社会史旗帜之下的史学革命正是社会史研究初倡者们所殷切期望的。这也从另一个方向上否定了社会史学科化的想法和做法。

成就之二：“社会史”以其天然的方法论（包括新角度、新态度）追求为新史学的创新指明了基本方向，既造就了今天史学的繁荣局面，也衍生出种种弊端。

费弗尔等人先有对传统史学重贵族、重叙事两大弊病的认识，

再有对此弊病相对应的下层平民和分析综合的感触，然后才找到了能够囊括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史”概念。正是这一特殊的背景使“社会史”首先代表着史学研究的新眼光和对新方法的期盼。因此，它的重要功绩便也集中表现为与眼光转变相因果的视野拓展和与研究方法相关联的通过分析综合对总体史的向往两个方面。视野的扩展带来的是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市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的探究，并从此延伸出对社会结构及所有群体、阶层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全面关注，最后发展为选题的无限碎化、多元膨胀和追求新奇。对叙事方法的反叛引发了对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方法的关怀，使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趋势，但在某些时候也同时造成了相关学科专业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泛滥和在引进理论方法上的生吞活剥。按说对总体史的追求是“社会史”内涵的应有之义，也的确被年鉴学派之后的所有社会史学者们所反复强调，但由于选题与方法上的碎化、多元吸引了史学家们太多的精力和整体研究的极大难度而被一再地放弃、推延。正如美国史学家斯特恩所云：“专题社会史有一种固有的离心倾向。专题的方法不仅缺乏较广泛的概念，而且也阻碍了适当的社会历史分期的发展，有时甚至阻碍了特定专题的分期。”为了进行综合，便不得不“根据比较传统的政治和思想史标准进行分期，而实际上未考证它是否适应手中的题目”^①。

总之，在社会史研究所造成的目前这种瑕瑜互见的复杂局面中，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因为专题的持续增加和方法的不断翻新带给史学界的首先是繁荣兴旺的局面和氛围；其次，这也是深化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因为彻底的拆解之后才有可能正确地重组。

① [美] 斯特恩前揭文，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 43 页。